

读书

D U S H U

2016

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D U S H U

J u l y

黎湘萍 台湾文学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2016 年合订本 / 《读书》编辑部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
ISBN 978-7-108-05957-4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690 号

编 辑 《读书》编辑部

封面设计 陆智昌 薛 宇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装 订 北京博丰伟业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0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上、下全两册)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文学与文学奖



从前没有文学奖，屈原、李白、曹雪芹都没有得过奖，也没得过稿费版税。莎士比亚与巴尔扎克、但丁与塞万提斯，都与奖项无缘。现在没有了屈李曹莎巴但塞，却有了各种气势不凡、金额不俗的奖。这样的奖，规格高、风头劲、动静大、争议多，令人视网膜充血。

在挪威，人们说，当年易卜生的戏剧名声很大，但是内容与台词过于尖锐，最后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另一位剧作家比昂松。在阿根廷，有人质疑为什么拉美文学的教父博尔赫斯没有得奖，却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科斯与秘鲁的略萨获奖。在日本，有人说，三岛由纪夫自杀除了他受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煽呼以外，也与开风气之先的他没有获得诺奖而是川端康成获奖有关。呜呼哀哉！

至于俄罗斯，更没的说，使中国的读

者如醉如痴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他们其实都赶上了诺奖时代，但他们都与诺奖不沾边。

那么在中国，由作家团体评一两个奖，每届奖了不少作品不少人，就更加众说纷纭了。有遗珠之憾，有不遇之悲，有酸涩苦辣，别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也有敢骂作协与红十字会的勇猛。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一千八百年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已经说得很透。何况当今，文学奖除了有文学性以外还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公关性、话语权力性、涉嫌可操作性等。有几个写作人做得到有足够的文学自信，对于获得或不获得大奖清明淡定处之？

“刘慈欣与科幻文学”笔谈 3

王洪喆 冷战的孩子

王 昕 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孙佳山 《三体》思想资源及其限制

汪 晖 “民族主义”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19

钟 准 体育运动中的政治 34

周 濂 用政治“锁死”科技？ 43

季剑青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54

刘泽华 法家在统一帝国中的作用 62

李新伟 “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 70

短长书

大学整体性危机的经费因素 乔卉 79

“汤冠费戴” 任晓 83

漫步书店街：城市空间中的新文学读者 刘潇雨 85

杨清媚 费孝通读韦伯 89

张冠生 江村八十年 99

黎湘萍 台湾文学的“探索者”与“革命者” 108

石小军 故纸中的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 117

品书录 125

由“下”看“上”与“合伙人效应”(王汎森)·代官制判的刑
名师爷(陆昕)·富布卢克及其《剑桥德国简史》(李雪涛)·
我如何认识波洛克(毛秋月)

马文韬 友谊,抑或是利用与被利用 141

刘文飞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49

杨凤岗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的主题与变奏 159

何 蓓 争论围绕豪泽尔 169

刘以林 漫画 33

王蒙 康笑宇 文墨家常 封二

“刘慈欣与科幻文学”笔谈 3

王洪喆 冷战的孩子

王 昕 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孙佳山 《三体》思想资源及其限制

汪 晖 “民族主义”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19

钟 准 体育运动中的政治 34

周 濂 用政治“锁死”科技？ 43

季剑青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54

刘泽华 法家在统一帝国中的作用 62

李新伟 “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 70

短长书

大学整体性危机的经费因素 乔卉 79

“汤冠费戴” 任晓 83

漫步书店街：城市空间中的新文学读者 刘潇雨 85

杨清媚 费孝通读韦伯 89

张冠生 江村八十年 99

黎湘萍 台湾文学的“探索者”与“革命者” 108

石小军 故纸中的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 117

品书录 125

由“下”看“上”与“合伙人效应”(王汎森)·代官制判的刑
名师爷(陆昕)·富布卢克及其《剑桥德国简史》(李雪涛)·
我如何认识波洛克(毛秋月)

马文韬 友谊,抑或是利用与被利用 141

刘文飞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49

杨凤岗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的主题与变奏 159

何 蓓 争论围绕豪泽尔 169

刘以林 漫画 33

王蒙 康笑宇 文墨家常 封二



“刘慈欣与科幻文学”笔谈

虽然一直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但刘慈欣与其小说《三体》，其实早已被广泛关注，在二〇一五年，更是获得了世界科幻殿堂最高荣誉的“雨果奖”，经过改编的电影《三体》也即将上映。所有这些文化现象，都表明科幻文学已经具备了“总体性”讨论的可能。但这种讨论如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而产生新的思想内容，尚需知识界做出认真努力。《读书》编辑部所约这组笔谈，即是尝试。

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

王洪喆

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一九八五年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中国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爆发式流行的科幻小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游说文学”（science fiction as a lobby literature）。瓦格纳发现，不像同时期外国科幻小说常呈现未来社会的各个部分（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故事重复讲述的，是在远离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边疆飞地，科研工作完全不受政治干预和资源限制地开展，同时在科学家主人公以外，政府、党、军方、工农都未扮演

任何角色。因此瓦格纳认为，新的科幻文艺是这样一种文学：通过描绘科学家在未来社会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来展现知识分子群体对科技兴邦的诉求。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幻文艺的矛盾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时期，也恰恰是国家科技预算大幅削减，尖端技术项目纷纷下马，武器和战略工程的“飞地”难以为继、逐步瓦解的时期。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春天”的同时，也带来了“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以市场换技术”等说法。

因此当《三体》这样的故事，想要在现实历史的时间轴中检索出一块资源无限供给的飞地以安放一个地外生命搜寻项目，并以此开启另一条时间线时，这个另类历史的现世接口便只能安放在六七十年代。而现实历史也正好终止在红岸基地的解体，即刘慈欣所提示的八十年代国防预算的削减。其后，故事就进入了与现实平行的另类未来。

冷战与“文革”，这一二十世纪内部尚未被打开的时空褶皱，在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中向我们展露了其危机与可能性并存的复杂面貌。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与过往的诀别，《三体》作为一个架空历史故事，从一开篇就是一段从冷战与“文革”中衍生出的替代性未来史，就其对我们原有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扰动而言，《三体》可算是一部十足的“冷战朋克”“‘文革’朋克”——在传统的建制性“文革”叙事中插入冷战元素，将历史的主舞台从城市政治运动转向大兴安岭深处的战略飞地和异端个体。沿着这条线索，由“红岸”和“地外生命搜寻”入手，考察这些冷战年代的科幻设定在二十世纪的起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打开《三体》的知识图谱和文化感觉结构的可能路径。

与地外文明接触的尝试，串起了从古代通灵术到现代射电天文

学的隐秘联系。在十九世纪末，叶芝所在的秘密会社“黄金黎明隐修会”（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已有借助“以太”和塔罗仪式进行太阳系通信和旅行的活动，而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在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研究以太和灵媒的物理学家，在“二战”后成为射电天文学的重镇。可见在利用无线装置从噪声中搜寻交流的可能性这一点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灵媒学与二十世纪的地外智能搜寻具有亲缘性。二者都希望和他者的接触是可能的，两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最痛切的关怀：哀悼、孤独、与死者和远方的接触。

与异类交流的渴望折射出人类对自身群体中异质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在冷战的阴影中达到高潮，事实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生命科学部门地外生命搜寻（SETI）的第一波浪潮“奥茨玛（Ozma）工程”的历史基本与冷战重合（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八）。而为了保证项目的国会预算，在冷战战略部门和科研机构中拥有多重身份的科幻、科普作家卡尔萨根起到了关键的游说作用。他描写 SETI 的科幻小说《接触》获得一九八五年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七位，小说一九九七年由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搬上大银幕，成为与同样出自他手的《回到未来》《阿甘正传》并称的主流美利坚故事。

相应地，对于地外生命可能存在形式的探索，也就逻辑地派生自应答、安置和驯服他者的帝国知识。正如扬·梅杰（Jan Mejer）在他一九八五年的文章《迈向宇宙社会学：异形的构造》中写道，最早有关异形的接触经验可追溯到欧洲殖民者对“第三世界”的扩张，对于欧洲人来说，土著是一种非人（non-human），建立在这种框架下对于原始人的初民想象，反映了欧洲帝国文化的宗教哲学，进而将自身的社会问题投射到神话学式的解决方案中。因此，对冷战两大阵营而言，外太空既是充斥黑暗他者的未知领域，也是可能取得资

源、治愈旧症、重获文明生命力的“新边疆”。

“红岸”与“新边疆”同源的证据，来自冷战时期阵营另一侧的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学界，宇宙社会学的最早建构，是多个有社会科学取向的地外文明研究方向的统称，比如地外文明的形成条件与可能形态、与其接触的预期情景及后果、未来太空殖民中人类如何与地外文明共存，以及星际旅行和空间研究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影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普兰（Samuil Aronovich Kaplan）于一九六九年编写了这一领域的首部文集——《外星文明：星际交流问题》，后由专门为美国翻译苏联科技情报的“以色列科学翻译计划”（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在NASA内部出版。卡普兰在开篇的导论中将宇宙社会学与宇宙生物学进行了对照性定义：如果宇宙生物学研究生命在地外环境下的起源和进化，则宇宙社会学要研究智能文明在此条件下的起源和发展，这一方面要借助对地球文明起源和成长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借助地外文明搜寻所可能获得的数据。

可见，地外社会学从一开始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理解 and 解决冷战时期的地球事务。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国首席智囊布鲁金斯递交给NASA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空间探索对于美国战略研究可能起到的广泛推动作用，报告建议NASA考虑开展关于和平利用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国际影响方面的广泛研究。在报告的最后专设一章梳理地外文明接触对人类社会的可能影响，报告认为：地球人是否可从此种接触中获益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的大量案例显示，当一个社会被迫要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文明接触时，往往发生的是自身的崩解，而另一些在此种经验中能够幸存下来，也总要付出惨痛代价，导致文明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剧烈转变。

报告认为要通过持续的历史和经验研究，考察不同国家人民及

其领袖在面对突发事件和完全陌生社会压力时的应对行为，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原始社会暴露在先进文明面前时如何招架，而这些不同会导致其中一些文明更加繁荣，一些苟延残喘，另一些直接灭亡。这类研究会给未来与地外文明的接触和斡旋提供对策，同时将帮助美国决定如何将这些信息透露给公众，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保留。

在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会牵头召开了多次以“地球以外的文化”（Culture Beyond the Earth）为主题的会议来讨论地外生命搜寻的文化效果，卡尔萨根和阿西莫夫等科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卷入了这些讨论。这些跨学科对话重点研讨与不同地外文化间的接触对于人类社会的可能影响，以及对“费米悖论”的各种解释路径。面对浩瀚星空中的“电磁静默”，学者们需要对“智能生命为何不与地球联系”给出合理推论。其中“动物园假说”认为地外文明已经在使用微型探测器观察地球，就像在观赏和研究动物园里的动物，这一情景从阿瑟·克拉克的小说《童年的终结》中获得启发，在这部一九五一年的作品的开头，外星文明对人类进行了持续数千年的观察，在人类即将飞向太空时降临地球，终结了意识形态对峙、军备竞赛和冷战。而另一种“死亡探测假说”则认为，具有猜疑和惧外特征的文明为了创造生存空间，可能一直在使用星际级武器系统性地消灭宇宙中的其他高等文明。这几乎是萨博哈根在六十年代《狂战士》系列故事的升级版，小说创造了一种可以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宇宙中巡航猎杀智能文明，而飞出地球的人类后裔“太阳系人”成为宇宙中唯一具有情感、终结狂战士的正义种族。

这些宇宙社会学模型与其说在研究外星人，不如说是冷战军事对峙博弈的外太空操演。事实上在核威慑的暗影下，自五十年代开展了针对“核冬天”的情景战略工作，科幻作者跟国防部门、工业界人士、社会科学家已经被组织在一起，进行预测未来的跨学科对

话和实验，其后衍生出大量如《疯狂麦克斯》的“废土文学”。而坎贝尔主编的科幻刊物《惊奇故事》在“二战”中一度遭到国防部门的严密审查，因其在1945年8月前刊登了一篇精确预言广岛原子弹打击的作品《死线》。可以说，作为在战争中针对未来的情景写作者，科幻作家堪称不确定时代的“面壁者”和“破壁人”。

因此，后世的未来学者认为，以阿瑟·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应用文学”（applied fiction），因为它们不仅启迪了军事技术创新，还引发了关于未来朝向的社会对话。这不是对文学本体的缩限，而恰恰是对文学边界和社会功能的延展，科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曾经占据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位置，沟通了通俗写作、纯文学、国防政策、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等多个场域。

被称作“中国克拉克”的刘慈欣，以宏大三部曲向我们展开人类与三体人之间的千年战争史诗，不经意间成为二十世纪冷战这一段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在未来舞台上的再次展演——三体游戏是一个反复进行的多人情景创建，而四个“面壁人”就如同四个战争替代方案的科幻写作者，未来史学派则几乎复制了冷战中的跨学科战略智囊工作。纵贯全书的主线，外星人即是挑战人类本性的终极他者，也可能触发救赎人性的未来通路——这正是冷战构造的核心特征，在危机四伏的“黑暗森林”中反求诸己。

作为冷战与“文革”的孩子，借由“东方红”与“煤油灯”“红岸”与“地外文明”的寓言，刘慈欣从二十世纪的动荡、匮乏与超越性中开掘出的科幻道路，始终是一种在不连续时代试图书写和把握历史连续性的努力。而成就这个中国幻想故事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记忆，在这歧义丛生、晦暗不明的地球往事里，长久缺席的中国经验被得以书写。

阅读《三体》的快感带给我们一个可能的思考，个体的想象力

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生成于特定时代的结构感和知识谱系中。由此，激活社会想象力的工程，即是激活一个社会自身历史与文化自觉的工程。

在一个健忘的时代，重新接续历史和未来的引线，二十世纪的丰饶正待叩访。

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王 昕

当一部小说尝试以最具想象力的方式谈论人类社会的边界与未来，并因此获得国际国内不同界别的回响时，对它的讨论自然也会蔓延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各种不同距离的解析让它成了一处过度解码的险滩。当我们想直接探寻刘慈欣小说的特别之处时，更好的方法便成了先溯流而上，从源头处做“深度模式”的考察。

阅读刘慈欣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刘氏科幻最重要的特质是不断地制造震惊体验。这种震惊表面上看部分源于小说中时空尺度的骤然变化，但实际上人物特写与宇宙全景间的两极跳切、叙事中蛙跳式的飞跃，都是为了描摹故事结构里根本性的翻转。正是这一翻转对日常价值的颠覆造成了读者难以言喻的震惊。

为了具体理解这种颠覆和翻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慈欣最早的短篇之一《微观尽头》。小说讲述的是为了解决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争论，进行的一场撞碎已知物质最小单位的实验。见证这场高能运动的主要人物，除了物理学家中国人丁仪和美国人琼

斯，便是哈萨克族牧羊老人迪夏提。这三个人形成了两组在刘慈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峙关系，第一组是东方与西方，第二组是科学家与普通人，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第二组。刘慈欣为了让与科学事业毫不相干的牧羊人能够来到控制大厅，用了这样一个理由：“他们认为这个物理学上的伟大时刻，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时刻，所以应该有一个最不懂物理学的人到场。”既然丁仪们占据了物理学的位置，那么牧羊人在这里其实占据的是全人类的位置，也就是说牧羊人的到场，正是一束全人类目光的在场。

对于全人类，这场实验并没有一场足球比赛重要，用小说中总工程师的话说，“实验结果出来后，能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对于理性经济主体为单位，以等价交换原则运行的现代社会，这场实验的价值约莫可以换算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然而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当刘慈欣的奇迹时刻降临，这场实验的价值便会发生突变，而迪夏提老人正是放置在这里提供前后统一参照的度量尺。

当刘慈欣引用阿瑟·克拉克的宇宙负片概念，创造了只有在文学中才可能的对空间“黑白颠倒”的本质翻转，实验被分成了两个阶段——翻转成宇宙负片之前和翻转成宇宙负片之后。在翻转之前，迪夏提这样评论——“你们这些世界上最最有学问的人，在找世界上最小的沙粒”；在翻转之后，迪夏提则说“你们在干真主的事”。美国物理学家复述为：“我们拥有了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全人类的目光中，这次实验可以被描述为两次“非等价交换”，第一次是最有学问的人交换最小的沙粒，第二次是最小的沙粒交换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第一次交换是以大换小，而第二次交换则是以小换取从未有过的“大”。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交换并非第一次交换的目的，两次交换之间是根本断裂的。

这种非等价交换让人想到乔治·巴塔耶的耗费理论，通过对马

塞尔·莫斯在《礼物》中描述的“夸富宴”这类不断升级的礼物经济的理论思考，巴塔耶发展出了这一为消费而消费的理念。相对于不断获取与积累的功利性生产，他将非生产性消费所导致的“丧失”视为人类活动更为本源的冲动。而这种耗费行为在宗教献祭场景中有着典型的体现，极富价值的牲畜与谷物被毫不吝惜地浪费与毁坏，有限经济中不断再生产的循环因此被迫中断。在刘慈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朝闻道》中，那些走上外星人筑就的真理祭坛，用自己的生命交换十分钟真理的科学家，仿佛再现了这种纯粹耗费的祭祀场景。拼尽全力阻拦科学家而不得的家人与政客，表现了系统无法与科学家们商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等价交换关系，谈判的不可能性被凸显，因此这些科学家的死亡也成为鲍德里亚所谓的象征死亡。在这种象征死亡面前，系统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一种抉择性另类价值的在场，让读者得以超越构筑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视域。

事实上刘慈欣的大多数小说都在破坏这个只讲求投入产出、经济效益至上的世界。例如《地球大炮》中挖穿地球的南极庭院工程，这条与长城、金字塔一样“无用”却更加宏伟的地心隧道，正是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描绘的耗费。而《中国太阳》里的水娃更是直接言明了等价交换经济准则对人类精神的戕害：“上世纪冷战结束后，经济准则一天天地统治世界，人类在这个准则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使我们更加坚信经济准则的正确性，它已变得至高无上，渗透到我们的每个细胞中。”想把人类目光重新引向太空的水娃，选择违反经济准则，将生命投注在“飞向星海，永不停泊”的耗费中。这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尾，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并不常见，为了给理想主义者更可感知的鼓舞，通过牺牲换来的可能性，往往会在未来交换为一个拯救人类的奇迹。最感人至深的例子是《乡村教师》，李老师用最后的生命交换西北山村的孩子背会牛顿三定律，